

翻译学科建设

——兼谈语际改写与翻译的外部研究*

赵文静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 453007)

[摘要] 翻译学作为新兴学科,需不断提升‘学’的含量,理论建设非常重要。本文针对目前学科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翻译研究在形式上应纳入语际改写形式;在内容上应涵盖外部控制因素。文章还探讨了翻译学的百科发展趋势。

[关键词] 广义的翻译;语际改写;广义的翻译研究;发展趋势;翻译学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JH 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08)04-0047-04

0 引言

翻译在高校成立单独的系科,成为高校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被视为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Mona Baker, 1998: viii)。如此说来,我国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仅4年的历史¹。因此学科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个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并做了相应的研究。本篇着重从文化转向角度就学科的理论建设提出建议,并探讨本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

1 注重广义的翻译,纳入语际改写形式

James Holmes(1974/1988)提出的社会学翻译研究(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为这个学科成为‘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操控派的代表人物 Andre Lefevere 和 Susan Bassnett(1990; 1998)提出的两个著名的转向²引发了翻译研究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将翻译研究的重心从内部(语言学的微观层面)转向外部(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等宏观层面)。这一转向从根本上纠正了译界重技能轻学理的倾向,注重探索普适性的学理。译界的这场革命旨在强调,翻译活动的最终使命是两种社会文化信息的转换和交流;交流的动机多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文化的需求,因此应该将翻译活动置于宽广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空间去认识和定位,把翻译的多种形式(不仅包括狭义的翻译,还包括多种类型的改写、仿作、伪译等以往被翻译研究拒之门外的形

式)及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因素(诸如材料的选择,读者的接受,翻译过程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作用等)都考虑在内(见赵文静,2006)。

文化派对翻译的定义(例如, Toury 1995; Lefevere 1992)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了以往被排斥在翻译研究之外的多种形式,甚至伪翻译(Toury 1995: 40-52)。其重要代表人物 Lefevere 直接挑战传统的翻译研究模式,将翻译视为不同程度的改写,因而各类语际改写如书评、百科全书、仿作、文学史、作家传记等成为翻译研究描述的对象(见 Lefevere 1992: 11-14; 赵文静, 2006: 28-41)。这是习惯于传统的规定性理论模式者难以接受的。最根本的,他们无法接受这些没有原文可供对照研究的‘广义的翻译’。这些观念反映在近年来的翻译理论批评著作中,因此以多种改写实践为对象的个案研究至今仍不多见。

然而,语际改写的多种形式的的确是中外翻译史上普遍存在却被严重忽略的现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不再依赖读原作家写的作品,而是读改写者的文献”(Lefevere, 1992: 3)。因此,这类语码信息非对应式转换,即广义的翻译拥有更多的读者,其影响应该说比狭义的翻译更大。比如我们心目中的托尔斯泰、司汤达、易卜生或狄更斯的形象多数来自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概述或评论而不是通过读他们具体作品的译本。只有通过对这些广义翻译

[收稿日期] 2008-04-22

[作者简介] 赵文静,女,翻译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河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史,文学翻译批评。

¹我国翻译教育专业化起步较晚,直到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才获教育部批准在新成立的高级翻译学院“设立了我国内地第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

² James Holmes(1972/1988: 72)提出社会学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 Andre Lefevere 和 Susan Bassnett(1990; 1998)又先后提出比较文化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08BYY002)

的描述和研究,才能全面地反映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翻译活动所受到的制约以及对当时社会的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单凭狭义的翻译研究不能勾勒出那个时期翻译活动的全貌,也根本无法解释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现象。许多实例说明,正是那些不忠实的翻译和诸多形式的改写,生动地塑造了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形象,对目的语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对易卜生作品的系列改写³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社会学家的易卜生,使这位挪威剧作家知名度大增,至今仍是最受欢迎的外国剧作家之一(赵文静,2006:196-265)。还有,解放后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史受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作家的选择、对作品的取舍以及对作品的再创作式地情节译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树立了他们笔下作家的形象。比如有本权威的《英国文学简史》将18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湖畔诗人之一 Robert Southey略去不写,将另外几位同时期的浪漫派诗人按照他们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分为保守派(William Wordsworth和 Samuel T Coleridge)和革命派(George G Byron, Perry Shelley与 John Keats),并且极力褒扬后者。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 Charles Dickens被拔高为反剥削、反压迫的斗士(见刘炳善1981)。这本作为高校教材的外国文学史塑造的外国作家的形象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和译者。如上所述,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是通过文学史、文学评论、外国作家传记或百科全书这些改写形式了解作家与作品的。因此它们对读者和目的语社会具有比狭义的翻译更大的导向作用,也直接影响着翻译的取材。比如马克·吐温被誉为‘金元帝国的掘墓人’(王建开2003:22;引自赵文静2006:73),他的作品被大量地译入中国,有些还被选入教科书。翻译研究如果不对这些形式给予足够的重视,势必影响研究的全面性和代表性。除了研究这些形式,还应考虑操控这些形式产生和接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单凭翻译的微观层面和内部研究,对许多翻译现象无法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因此在注重广义翻译的基础上,还必须强调广义的翻译研究。

2 加强翻译的外部研究,注重翻译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以往的翻译研究过多着眼于狭义翻译的内部研

究,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对这一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恐怕连翻译界内部也没有争议。正因为如此,数百年来语言层面的翻译批评、等值理论、翻译的经验之谈被作为正宗翻译研究;对西方文化派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提出质疑,指责该流派夸大了社会因素的控制作用,对翻译实践指导性差。这是理论认识上的一大误区。如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已由规定性一统天下到描述性规定性共处,翻译理论也在吸收了邻边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描述性理论, Holmes提出了社会学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ociology; or socio-translation studies”(1972/1988:72)理论,然后是文化操控理论(Hermans, 1985; Lefevere, 1992; Toury, 1995; Bassnett and Lefevere, 1998)和地域政治理论等(Venuti, 1995; Baker, 2006)。理论概念方面,无论是 Benjamin的‘原作的来世’“afterlife”和‘再生’“continued life”(1923/2000:16, 19)还是 Toury的‘描述性翻译研究’(1985);从 Lefevere的‘改写’(1985; 1992)到 Lawrence Venuti的‘异化’与‘归化’翻译(1995),实质上都在描述源信息在新的文化语境控制下被重新部署的过程以及所产生的效果(赵文静,2006:6)。

笼统地说,这些理论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角度对翻译从宏观上进行外部研究;具体地说,就是对翻译活动和与之相关的因素——比如译者、读者、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目的语社会的需求等——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制约进行描述。这些理论本身是用来分析已经发生的各类翻译活动,解释这些活动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关系,不是为具体翻译实践定标准。尽管这些理论还有其不尽完善之处(见 Snell-Hornby 1988:13-25;赵文静2006:61-75;78-84),但是它们在翻译理论史上的里程碑作用和对描述性翻译研究开拓性的功绩是无可否认的。

狭义的翻译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形式,且不说它是否是唯一可行的形式;两个版本是否可能对等;即便是可能,我们也不能不考虑译者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而不选其它的,为什么这样译而不那样译;译作是如何被接受的以及对目的语读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因为毕竟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语码转换,绝大多数情况下,译者不是单纯的旁观者。翻译研究还应该关注这些活动究竟

³即胡适的文学评论“易卜生主义”(1918/1987),模仿易卜生所创作的话剧《终身大事》(1919/1987)和与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剧本《娜拉》(1918)。

是怎样进行的。翻译活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否被评价,如何被评价;是否被模仿,如何被模仿以及怎样被载入翻译文学史的。因此翻译研究应该描述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发现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与制约关系,这是强调翻译研究在关注语码转换的同时,也要注重语言符号所包含的权力以及社会的诸多因素赋予或操控语言符号转换的权力。

的确,翻译研究不应该忽视这诸多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从选材到成品的接受的控制和影响。改写理论认为,文学翻译过程就是译者和接受环境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诗学对文本的操控过程;强调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也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的(Lefevre and Bassnett, 2001: 3)。因此翻译研究不能只在语码转换圈子内作文章,还应注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例如选材方面,对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对国别文化的选择、对题材的选择等都不是译者任意而为的(见赵文静, 2006: 267-300)。再比如,一种作品为什么会在异国他乡成为经典,是由很多翻译外部的因素决定的,翻译的忠实与否并非最根本的因素。社会需求、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译者所享有的话语权(discourse power)和舆论力量(patronage)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林纾翻译的182种外国小说, Ezra Pound 翻译的中国古诗集 *Cathay* 《华夏集》都对目的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演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人都不懂原文或不精通原文,但是尽管如此,前者在中国翻译史上名垂青史;而 Pound 的 *Cathay* 《华夏集》发起了美国印象派诗歌运动。其中有一首李白的诗《长干行》经过 Pound ‘错误百出’的翻译,竟然作为‘美国诗’进入“美国名诗101首”,成为美国文学的普及读本和美国权威的选集《Norton 美国诗歌集》必选之佳作。这在中外翻译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谢谦 2001: 75,转引自祝朝伟 2005: 84)。如果不借助 Lefevre 的诸多“控制因素”(1985; 1992; 见赵文静 2006: 50-61)对翻译活动作动态的描述和外部研究,仅仅归功于他们的译作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赛珍珠现象也反映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从1933年到1949年,赛珍珠的18种作品被译成38个中文版本,然而解放以后的30多年,赛珍珠的作品既没有再翻译也没有重印。很显然,作品内在的诗学审美价值并没有改变,所不同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她的反共立场相对立(刘龙, 1992: 473-474; 转引自赵文静 2006: 72)。

翻译对国别文化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它反映出文化的强势、弱势以及国力的兴衰, Lawrence Venuti (1995: 10-11)曾经从地域政治的角度考察过

翻译的方向,用大量的数据说明,处于强势文化的美国每年译出书种的数量是译入书种数量的许多倍。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每年要翻译将近200种中国图书,而甲午海战,中国海军惨败给倭寇之后,这个数量迅速降到了每年2-3种(赵启正 2004)。很显然,那个时候日本人认为学习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16世纪以来,由于不断的闭关锁国,中国逐步落后了,文化输入与输出一直存在逆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数据足以说明,直到本世纪初,我国对外版权贸易逆差还居高不下:“对欧美国家的版权贸易逆差是1:100以上。2004年我国从美国引入图书4068种,我们出口的只有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而出口的只有16种;”(赵启正, 2006: 10)。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翻译的方向也会随之变化,汉译英人才的需求量将快速增加,这些都应成为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

3 翻译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

3.1 学科定位和专业方向更趋合理

不合理的学科定位直接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随着翻译专业各级学位点的设立,“希望不久的将来,翻译学能够被“作为二级学科正式列入我国的研究生学科目录”(谢天振, 2005: 57)。

3.2 翻译硕士专业方向将呈现出多种类型。2007年1月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下达《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D)设置方案》的通知”。这是继2004年获准设立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之后,翻译学科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专业学位的设立,强调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毕竟,翻译学人才不等于翻译人才,二者不可偏颇。翻译能力的培养需要系统化、专业化。翻译教育应该朝着门类分得更细、研究范围更广的方向发展。普通外语翻译将逐步转向更具体的专业性翻译方向:比如分成口译和笔译,口译在形式上分为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根据目的和用途又可分为会议翻译、法庭翻译、社区翻译等。笔译又可细分为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如:科技翻译、经贸翻译、法律翻译等)、网络翻译和机器翻译等方向。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师资力量与教学特点开设独具特色的专业选修课,使各培养点的翻译专业硕士既具有共性,又具有特色。

3.3 研究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翻译理论研究类型在多层面跨学科的基础上会更加多元化:翻译理论会朝着多元角度的方向发展,除了语言学角度,文化学角度,还有叙事学角度(Baker 2006),地域政治学角度(如 Venuti 1995)和后殖民角度(如 Maria Tymoczko)等。将民族志(Ethnography)和人类学(Anthro-

pology)的研究模式应用于翻译研究,也是发展的趋势。

多样化则是指研究领域拓展至(1)语内翻译:文化内的阐释与改写——比如对中国哲学思想经典孔子老子庄子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重新解读(百家讲坛现象);(2)符际翻译:跨语符的翻译比如手语(Sign Language)等。

3.4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今,最自然、最流行、最便捷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文本形式,而是现代化的媒体,如网络、电视、电影、戏剧和广告甚至短信息等。这些媒体的翻译研究会逐渐进入主流。此外机器翻译研究前景看好。

3.5 翻译史的研究也会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研究的热点。随着翻译理论不断发展,重写翻译史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就是说要以新的理论,从新的角度审视和研究翻译史。史类研究与翻译理论研究一样,也存在‘重视微观层面,缺乏宏观研究’的问题。对翻译家的定位、翻译类型的确认、翻译文学对社会文化变革产生的影响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比如如何确定某一时代的重要的翻译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争议,是以翻译数量还是以质量为准?是以译者的知名度还是以原作的知名度为基准?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如何界定?与翻译直接相关的改写形式如何纳入研究范畴?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定位等。

4 结论

长期以来围绕社会层面对翻译所做的哲学研究较少,要使翻译学‘学’的含量更高,理论建设任重道远。由于翻译学科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跨学科性,与邻边学科之间的隶属关系及其研究方法等需要大量的理论依据和文献支撑,学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有很大的空间。翻译学科的实践性决定了在加强哲学性学理研究的同时还需作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随着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宽,信息化社会的迅猛发展,翻译理论研究类型在多层次跨学科的基础上会更多元化;翻译学的理论建设将会更系统化。翻译学学科建设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 [1] 胡适.易卜生主义[A].易竹贤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7:153-167.
- [2] 胡适.终身大事[A].易竹贤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7:41-52.
- [3] 刘炳善.英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1.
- [4] 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M].上

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5] 谢天振,高方.关于当前几个重要翻译问题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1):55-57.
- [6] 祝朝伟.构建与反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7] 赵启正.翻译是文化的翻译[J].文化大传播,2004,(10):18-19.
- [8] 赵启正.文化振兴是实现强国之梦的必需[J].外交评论,2006,(2):10-11.
- [9] 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10] Baker Mona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11] Baker, Mona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12]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A]. trans. by H. Zohn, in Lawrence Venuti (ed.), 2000,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23/2000: 15-25.
- [13] Hemans, Theo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London: Croom Helm. 1985a.
- [14] Hemans, Theo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A]. in T. Hemans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London: Croom Helm. 1985b: 7-15.
- [15] Holmes, Ja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R. van den Broeck (ed.)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Amsterdam: Rodopi, 1972/1988: 67-80.
- [16]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Lefevere, André and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Where Are W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S. Bassnett and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Shanghai: Shanghai waiyu jiaoyu chubanshe, 2001.
- [17] Snell-Hornby, Mar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1995.
- [18] Toury, Gideon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 in Theo Hemans (ed.) 1985a: 16-41.
- [19]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and N. Y.: Routledge, 1995.
- [20] Wellek, Rene *Concept of Criticism*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